

民族主义“武器化” 及其对世界秩序的塑造

田文林

[摘要] 民族主义具有多重功能，这使其自诞生之日就出现被“武器化”趋势。民族主义原本是欧洲地缘版图碎片化的产物，其对欧洲国家的形成具有正向的国家建构功能，但欧洲列强出于霸权统治的需要，拒绝在亚非拉地区适用“民族自决”原则，由此形成“在欧洲是民族平等，在亚非拉是民族压迫”的双重行为准则及与之相应的双重世界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这种不合理世界秩序，但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又反过来借“民族自决”之名肢解非西方国家，由此造成世界地缘版图持续碎片化。

[关键词] 民族主义；武器化；世界秩序；影响

民族主义是对世界政治秩序塑造能力最强的政治思潮之一。自民族主义产生之日起，该思潮便对现实政治产生了持久而复杂的影响。尤其是民族主义含义的模糊性和多义性，使之从一开始就成为高度政治化的地缘政治武器，并由此对世界政治秩序的塑造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当前中美博弈升温、美国频频炒作中国的新疆、西藏、台湾等问题的背景下，深入探讨民族主义的“政治化”和“武器化”问题，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一、研究背景及基本情况

“民族主义”概念是国际政治学界最难准确界定的术语之一。究竟什么是“民族主义”，学界始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无怪乎有人感叹“以民族主义的名义进行归类的现象过剩症表明，它可能是当前政治学词汇中最为模棱两可的概念之一”^①。

就民族主义的奋斗目标来看，英国学者米歇尔·赫斯特把民族主义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国家建构的民族主义（State-building nationalism），这是一种体现为在给定的国家中试图进行同化（assimilate）和合并（incorporate）文化疆域的民族主义；第二，外围民族主义（Peripheral nationalism），这种民族主义发生于文化疆域内抵制加入一个日益膨胀的国家，或者试图脱离并建立自己的政府之时；第三，领土收复的民族主义（Irredentist nationalism），这种民族主义的发生是与试图通过与邻近国家合并来扩展现有国家边界联系在一起；第四，统一的民族主义（Unification

作者：田文林，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tianwenlin89@163.com。

*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历史政治学与世界政治研究建设专项”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区域国别学建设专项“当代中东宗教与政治”（AS2022009）阶段性成果。感谢审稿人提供的专业细致的审稿意见。文责自负。

① Michael Hechter. *Containing Nationalism*. Oxford University, 2000, p. 6.

nationalism), 它试图将一个在政治上分裂但在文化上同质的区域合并为一个国家。^①

另一位学者珍妮·达莫尼奎·拉法伊认为, 民族主义至少有两层非常不同的含义: 它首先是指一种寻求建立新国家的意识形态; 其次, 它还是一种旨在保持现状的意识形态。它渴望保持现存国家(包括它的领土和人口), 并给予政府令所有其他对象(包括公民的福利和基本权利)服从于它的最高权力。拉法伊把后者称为守成民族主义(Conservative nationalism)。^② 按照安德鲁·赫伍德的说法, “守成民族主义倾向于在已经建立的民族国家内, 而不是在国家建立过程中进行发展。它更多关注体现在爱国主义感情中的社会凝聚力和公共秩序, 而对普遍的民族主义的自决原则较少关心。”^③

就民族主义的基本构成来看, 徐迅把民族主义分解为政治权力(国家)、社会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三个层面的内容。^④ 余建华提出在三重含义上理解民族主义: 首先, 民族主义是一种心理状态或思想观念; 其次, 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体系或意识形态; 再次, 民族主义是一种社会实践和群众运动。^⑤

在笔者看来, 民族主义同时具有民族情感、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力量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 民族主义体现为一种强烈的情感。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说: “民族主义是对主权的文化感受”, “民族主义是一种情感, 它能够被用来动员整个民族共同体以支持国家政策。”^⑥ 国家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以国家为认同对象的民族主义, 自然表现为对现行国家的深厚感情。第二, 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和其他政治意识形态(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共产主义)相比, 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可能是最为感情化的一种, 这种感情诉求经常强烈到不知是否该把它归结为一种思想主张的地步。第三, 民族主义也是一种社会政治运动。在很大程度上, 民族主义乃是一种“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实践型意识形态。甚至可以说, 没有政治实践的民族主义根本算不上完整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政治实践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理解: 一是体现为群众性社会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 二是体现为国家权力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含义的模糊性使其政治功能天然具有多样性。它就像变色龙一样因时而异、因势而异, 不断根据环境做出改变。“在世界的一些地方, 民族主义是伴随自由宪政和民主政府而出现的, 而在其他地方它却是帝国征服带来的一种反应。”^⑦ 民族主义的多重政治功能和巨大政治威力, 使之从诞生之日就被各种政治势力加以利用, 由此导致民族主义的“武器化”趋势。尤其在西方主导的世界政治秩序中, 少数西方大国为了实现自身霸权利益, 充分利用民族主义的含糊特征, 将其作为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战略工具。它们交替使用“民族自决”和“民族压迫”两种职能, 将诸多非西方地区搅得动荡不定, 并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与重塑了原有的世界政治秩序。

二、民族主义的起源及其对欧洲国家的重新塑造

(一) 民族主义原本是欧洲地缘版图碎片化的产物

从历史源头看, 民族主义理论和“民族国家”模式最早发源于西欧, 它是欧洲病态地缘政治环

① Michael Hechter. *Containing Nationalism*. Oxford University, 2000, pp. 15-17.

② Jean-Dominique Lafay. “Conservative Nationalism and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 Albert Breton, et al. (eds.). *Nationalism and Ration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5, p. 159.

③ Andrew Heywood. *Political Ideologies: An Introduction*. Macmillan, 1998, p. 171.

④ 徐迅:《民族主义》, 47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⑤ 余建华:《民族主义》, 11-13页, 学林出版社, 1999。

⑥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 264-265页,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⑦ 詹姆斯·梅奥尔:《民族主义与国际社会》, 2页,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境滋生出来的特定政治思潮和政治单元。自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大陆就呈现出小国林立的状态。1618—1648年爆发的三十年战争，最终形成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将欧洲碎片版图永久化。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宗教被从世界政治的舞台上赶了出去，欧洲君主们开始用“教随国定”来定义教会和国家的关系。^①通过该条约，欧洲各君主国开始摆脱封建教会的束缚，成为真正独立和终极意义上的政治单位。

战争是民族主义在欧洲落地生根的主要助产士。战争导致欧洲地缘版图不断变化重组，最终形成现在欧洲主权国家的雏形。根据蒂利的研究，从公元1000年开始，3000万欧洲人生活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政治单元里。在意大利就有200个到300个城市国家。到1500年，欧洲人口大约8000万，这些人分属大约500个国家、准国家、雏形国家和类似于国家的政治单元中。但持续不断的战争使欧洲国家数量削减到30个左右。^②尤其1789年法国大革命及随后的拿破仑征服欧洲大陆行动，极大地促进了民族主义在欧洲的传播。^③

总体来看，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出现乃是欧洲特定环境下的自然历史过程。“西欧的民族国家是由中世纪迈向近代的国家形式。这个发展过程是：普世教会国家—王权国家—民族国家。”^④从内在逻辑看，欧洲民族国家的发展始终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政治体制变革和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同步进行的。从世界范围看，率先建立“民族国家”的荷、英、法等国发展迅速，又将这种产自欧洲本土的民族国家体系带到全世界，使之成为世界政治体系中标准版本的政治单元。

（二）民族主义对西欧国家的重新建构

民族主义本身就是欧洲特色的政治思潮，因此它自诞生之日起便对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的国家建构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建构”有两层含义：一是自上而下的政权建构（state building），即不断增强中央政府的资源汲取和分配能力，最终形成强政府；二是自下而上的国族建构（nation building），即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增强民众的国家共同体意识，使所有国民都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一员。民族主义在这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 民族主义通过建立民族国家，逐步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国家权力系统

民族主义是民族国家的思想先导，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的最终归宿。国家一旦建立，它便成为不断进行自我完善、自我强化的自组织。在传统生产方式和政治单元中，经济和社会交往的相互隔绝状态，使上述公共服务往往由当地政府或企业提供。然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各地间横向交往日趋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原来各自为政的治理方式日趋失效，人们越来越希望国家出面，来保护私有财产、提供统一货币、促进企业发展、补贴刺激经济、建立关税壁垒对抗外来竞争，等等。与此同时，各方也需要国家修建铁路、公路、堤坝和港口设施，提供污水管道系统和水资源，兴办教育，以及建立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国家要想实现有效统治，最关键的就是要垄断暴力机器，增强对各种资源的汲取和分配能力，提供基本公共产品（如保卫国家、建设基础设施、维护公共秩序，等等）。而国家要想提供上述公共产品，又离不开巨额的财政收入作为基础。要想增加财政收入，就要求国家必须建立政府和官僚机构，增强政府的征税能力。所有这些，都会在不经意中巩固和强化国家的政权结构。

需要指出的是，民族主义鼓舞下的频繁战争，客观上促进了欧洲的国家建构进程。在欧洲地区，各国间频频发动战争，巨大的战争消耗迫使各国强化对内汲取能力，由此客观上强化了国家的

^① 安东尼·帕戈登：《两个世界的战争：2500年来东方与西方的竞逐》，247—248页，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

^② 罗伯特·马克思：《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118页，商务印书馆，2006。

^③ 彼得·李伯庚：《欧洲文化史：全球史视野下的文明通典》，42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④ 彭树智、黄倩云：《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26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汲取和分配能力。在7个多世纪里,欧洲国家大约70%至90%的财政资源几乎持续地用于军事力量的组建和使用。由于欧洲经济的扩张和征服与保护市场和领土的军事行动交织在一起,战争的目的愈发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性质。^①17世纪的荷兰,90%的预算都用于战争;1760—1800年间,普鲁士军费开支占总支出的74%~90%。^②另有统计表明,在18世纪,有78%的年份存在着大国之间的战争。到了19世纪,则只有40%的年份中发生大国之间的战争。^③庞大的战争开支迫使欧洲国家强化税收征收体系,由此强化了政府对领土的统治和管理能力。相比之下,帝国性国家疆域太大,难以有效动员自身资源;而意大利城市国家又幅员太小,不足在战争中获胜。这样,在欧洲大陆长达数百年的战争中,民族国家这种政治单元最终脱颖而出。与此同时,由于统治者征税损害地主和资产阶级利益,因此双方反复博弈,统治者不得不让渡部分权力,建立各种形式的代议机构,统治者征税前必须征求代议机构批准。国家官僚机构也在征税过程中成长起来。^④

2. 民族主义强化了民众对国家的忠诚和共同体意识

在罗马帝国及其后相当长时期,民众将基督教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认同标准。在此之后,欧洲各国一度将君主和国王本身作为效忠对象。直至《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很久之后,“民族”才变成建立国家和确定忠诚的主要依据。“民族”概念原本由绝对君主制国家发展而来的。民族的精神认同最初是君主的神圣之体,之后才将领土和民众作为神圣抽象物加以膜拜。国家认同是一种文化的融合的认同感,其基础是血缘关系的延续性、领土的空间连贯性和语言的共有性。^⑤

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有赖于国族建构,借以培养和强化民众对“民族国家”的政治效忠。在内部,民族国家及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一刻不停地忙碌着努力创造出、再生产出纯净的人民;在外部,民族国家则创造出种族差异,划定疆界,以支持主权的现代主体去除统治的限制。^⑥具体地说,就是从族裔认同转向政治认同,从排他性认同转向包容性认同,从血缘性认同转向地理认同。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法,民族国家本质上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国族建构本质上就是个“想象”的过程。^⑦

具体来说,欧洲的国族整合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政策。

一是借用传统文化符号来培养共同政治象征。民族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回溯性的社会政治思潮。它的奇特之处在于,它存在的正当性来自与历史传统的天然联系。通过追溯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和历史文化的灿烂辉煌,民族主义为凝聚广大民众、培育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命运共同体感,提供了一种通俗易懂、简单易行的政治说教方式。欧洲各国统治者到18世纪末期才开始鼓吹民族国家意识。民族国家被说成是一种独特的统一体。各国都从国家的观点重新撰写历史,把国家说成是民族和社会在政治结构上的自然形式,并刻意宣传其中的民族对外战争和历史伟人对民族历史所起的重要作用。无论文学艺术和名胜古迹,都是歌颂民族的历史。过去被看作“黑暗”的中世纪,到19世纪则被认为是欧洲民族国家的由来而受到歌颂。^⑧

二是借助现代教育体系和大众传媒来培育全民共识。全民教育和大众传媒在文化整合过程中发挥

①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卷),689-69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② 王湘穗:《币缘论:货币政治的演化》,91页,中信出版集团,2017。

③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2卷),450-4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④ 罗伯特·马克思:《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119页,商务印书馆,2006。

⑤⑥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116-117、14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⑦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Editions and NLB, 1983, p. 15.

⑧ 彼得·李伯庚:《欧洲文化史:全球史视野下的文明通典》,425、43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义务教育是达到国族建构、实施教化目标最有效、最理想的手段和工具。^① 它们能够为领土范围内的居民提供并传播一种适应民族主义政权统治需要的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并通过无处不在的宣传和灌输，把这些外在、后天的东西变成了民众内在、先赋的政治观念。

三是通过颠覆原有价值观和社会规范来强化共同命运。民族主义一般是通过两条外在的途径来培育命运共同体：即强调内部的一致性和对外的排他性。在政治实践中，民族主义政权为加强内部团结，在对外政策中往往有意无意地采取文化民族主义的态度，甚至借助强调和夸大外部世界威胁的办法来实现内部团结。不过，民族主义过分强调统一性和同一性，追求纯洁与纯粹为欧洲埋下社会动荡的隐患。欧洲各国要求本国民众使用同一种语言，将地区文化纳入国家的框架。盎格鲁化、俄罗斯化、瑞典化的运动被强行推行，连统治集团的宗教也往往同时被强加到丧失独立的不同民族头上。从伊丽莎白一世起直到19世纪反对爱尔兰天主教徒，欧洲地区的所谓“种族净化”运动始终没有停歇。这种强行进行民族同化的最终结果，就是欧洲各地区的少数民族对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历史、宗教都更为珍惜。^②

三、欧洲殖民者的双重标准与双重世界体系的出现

民族主义原本就具有两面性和易变性特征：民族主义强调民族国家的自我意识，致力于实现国家团结统一，但这种民族主义意识很容易越过合理界限，演变为唯我独尊的“民族优越论”，甚至成为替民族压迫正名的历史反面。在现实政治中，欧洲列强将民族主义的这种两面性作为实现地缘政治目标的手段充分利用，它们在欧洲本土奉行民族自决，在海外则实行殖民扩张，由此导致近现代世界政治出现了明显的双重世界体系并存局面。

（一）欧洲列强在“民族自决”问题上的双重标准

民族主义本身就是欧洲地缘版图碎片化的观念反映。而欧洲地缘版图碎片化又是欧洲诸国“谁也吃不掉谁”的客观结果。近代以来，欧洲列强为了确保自身生存安全，地区政策的共性特征就是都奉行均势原则，也就是防止任何欧洲国家取得决定性优势，联手抵抗任何旨在实现欧洲统一、建立大一统帝国的尝试。历史上，许多尝试统一欧洲版图的帝国性国家，如16世纪的西班牙帝国、18世纪拿破仑时期的法国，以及20世纪的德国等，其统一欧洲版图的野心或雄心均因其他国家激烈抵抗，最终以失败告终。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欧洲大陆始终缺乏一锤定音的“核心国家”，才出现了将分裂现状合理化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族自决、主权平等等国际法原则。

在世界历史上，19世纪被普遍视为帝国主义年代，但在欧洲本土，自1815年拿破仑失败后，欧洲各国间凭借“欧洲协调”的均势机制，实现了近百年和平状态。就此而言，民族主义思潮倡导的主权平等原则已经得到充分贯彻，一个现代性意义上的世界政治秩序已经在欧洲形成。

然而，只要将目标从欧洲大陆转向整个世界便很容易发现，民族自决、主权平等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国际法准则的光辉很少能照射到亚非拉地区。欧洲国家一方面大力倡导一系列革命性观念（如人类平等、民族自决），另一方面又试图将世界其他地区的民众置于欧洲统治之下。在欧洲地区，欧洲国家大体遵循和认可1648年以来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在欧洲之外，这种正向效能的民族主义则演变为民族狂热情绪下主导的帝国主义，使整个世界始终笼罩在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阴影之下。

^① 诺曼·里奇：《现代欧洲史（第5卷）：民族主义与改革的年代1850—1890》，96—100页，中信出版社，2016。

^② 彼得·李伯庚：《欧洲文化史：全球史视野下的文明通典》，42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

这样，近代欧洲列强主导的世界秩序，就变成了“在欧洲是民族自决，在亚非拉是民族压迫”的双层政治结构。欧洲列强都是以主权国家的面目呈现出来的现代殖民帝国。^①即使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欧洲国家拒绝在欧洲之外贯彻民族自决原则。由此，民族自决理论面临一个重大悖论：伴随着欧洲国家为政治自由而进行斗争的是欧洲帝国向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扩张，最强大的帝国（英国和法国）同时也是自由宪政主义根基最牢以及民族统一进程最成熟的国家。^②

之所以出现“自由主义国家推行殖民主义政策”，并由此造成民族自决与民族压迫并存的双重世界体系，最直接原因是西方国家一枝独大，由此导致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近代以来，欧洲列强凭借工业化优势率先实现崛起。这些欧洲列强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其从称霸世界和资本积累角度出发，肆无忌惮地在全球进行殖民扩张和血腥征服，因此其在民族自决问题上言行不一并不意外。

从更深层次看，欧洲列强的这种双重标准，还与民族主义本身的两面性特征有关。民族主义将“民族”作为划分政治单元的标准，而“民族”又是基于血缘、语言、文化等原生性因素，这使民族主义天然带有种族主义的成分，而种族主义又天生具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排斥、种族压迫乃至种族灭绝倾向。“绝对的种族区别的建立是同质性国家认同感的基础之精髓。它又同种族压迫、社会清洗的现实层面相呼应。”^③

事实表明，在国际社会中，这种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在欧洲的确立以及国族整合的完成，正是以“他者”（亚非拉地区的原住民）作为对立面和前提条件的。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认为：“现代主权的世界是一个二元论世界，它分裂为一系列二元对立：自我和他者、白人和黑人、内部和外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④民族国家现代性的这种内在冲突，体现在全球范围就是一种与外部世界的持续冲突，乃至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支配性统治。

这样，民族主义原则确立的民族—国家的主权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奠基石。帝国主义是欧洲民族国家的主权超过它们自身疆域的扩张。这是因为，民族—国家确立的国家边界无形中确立了权力的中心。从那里出发，欧洲列强可以通过经济渗透、暴力征服等一系列举措，将自身的权力施加于外部疆域。被殖民者不仅在生理上、地域上、权利上，乃至思想上同欧洲人隔离开。被殖民者被塑造成为他者，被殖民者抛出欧洲一切文明价值的界定之外。^⑤

尤其到19世纪后期，随着欧洲国家初步完成工业化进程，欧洲列强为获得足够的原料与产品销售市场，亟须拓展海外市场、获取更多资源，因此纷纷加大对外殖民扩张力度。这使欧洲列强日渐从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能力与意图日趋强烈。1871年普法战争之前，欧洲大陆的国家（包括俄罗斯）主要将注意力放在欧洲本土。但1871年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西欧近来不会出现重要的重新调整。于是，欧洲国家的民族抱负转向欧洲以外的领土。欧洲列强将拥有多少殖民地视为国家强大与否的关键指标，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秘诀所在。^⑥

在这种背景下，欧洲列强原本具有正当性的自由民族主义，日渐被自大而偏狭的民族沙文主义取代。这种民族主义强调本民族的优越性，越来越希望通过牺牲法治和个人权利来取得单一民族国家的强盛和荣耀。^⑦到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大众崇拜。殖民地变成国家强大和威望的标志，每个阶层的民族主义者都想拥有。^⑧正是在日趋强烈的帝国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驱动下，欧洲列强在亚非拉地区掀起了瓜分世界的殖民扩张狂潮。

① 强世功：《“天下一家”VS世界帝国：“深度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未来》，载《东方学刊》，2021（冬季号）。

② 詹姆斯·梅奥：《民族主义与国际社会》，5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③④⑤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124-125、168、149-15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⑥⑦⑧ 诺曼·里奇：《现代欧洲史（第5卷）：民族主义与改革的年代1850—1890》，103、65-66、105-106页，中信出版社，2016。

（二）民族国家体系与殖民等级体系并存

英国是欧洲最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国家转型的国家，同时也是海外殖民地最多的欧洲列强之一。从1871年到1914年，英国人一共打了30场殖民—殖民地战争。^①1815—1865年间，英国每年平均扩张兼并25.9万平方千米土地。^②英国的殖民版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达到顶峰。当时英国占据了世界上1/4的陆地面积和近1/4的全球人口，是仅次于它的竞争对手法国的三倍多。^③1900年英国的势力范围远远超过了当年罗马帝国的版图。英国只有4000万人口，却占有50块殖民地（总人口超过3.45亿，陆地面积1160万平方英里），是英国本土面积的96倍。^④英国号称“日不落帝国”，足见其殖民版图之大。

其他欧洲列强同样不甘示弱，拼命在亚非拉地区拓展殖民地。据统计，在19世纪头75年里，西方国家平均每年占领21万平方千米的殖民地，在其后25年里平均每年征服62万平方千米的殖民地。从19世纪70年代起，资本主义列强掀起了夺取殖民地的狂潮。到1900年，非洲90.4%的土地、亚洲56%的地区、美洲27.2%的地区以及澳洲的全部，都沦为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同时还出现了很多半殖民地和附属国。^⑤19世纪开始时，西方国家声称拥有地球表面55%的陆地，但实际上只拥有大约35%，到1878年，这个比例已经升至67%，到1914年时达到85%。^⑥另有统计表明，1878—1913年间，欧洲国家在海外索取860万平方英里的领地，占全球陆地面积的1/6。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除了无人居住的南极洲外地球陆地面积的80%都是在欧洲国家或欧洲殖民者的控制之下。^⑦

英国坚决拒绝将“民族自决”原则应用于亚非拉地区，还血腥镇压任何旨在打破现状、谋求民族自决的社会政治运动。1920年，英国遭遇阿拉伯库尔德人叛乱之后，轰炸了伊拉克骚乱的村庄，通过喷射芥子气进行摧毁性打击。殖民地事务大臣丘吉尔公然宣布：“我不理解使用毒气为何如此令人厌恶，我强烈支持使用毒气来抵制不文明的部落，要不然他们会迅速扩展为一场恐怖活动。”^⑧1950年肯尼亚出现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武装组织“茅茅党”，英国对此的反应是残酷的镇压，大约有2万人死于战争，不下1000人在袋鼠法庭上经过仓促审判后被处决，比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所处决的当地人还要多。^⑨

总之，欧洲列强在“民族国家”问题上体现出明显的双重标准：在西欧国家内部，他们通过签署《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建立起相互平等、彼此尊重独立和主权的民族国家体系；但广大亚非拉地区则不适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一“文明国家”的主权国家体系，原因就是这些地区尚未开化，那套适用于“文明国家”间关系的主权国家体系，在这些“野蛮、落后”地区并不适用。相反，欧洲国家进行海外扩张时，利用“国家主权”原则相互承认各自在海外领土的主权，由此给他们海外掠夺的土地披上合法外衣。马克思曾指出：“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⑩换句话说，在自诩为“文明先进”的欧洲殖民者眼中，其竭力要塑造的世界体系是个等级森严的双重世界体系。

①⑧⑨ 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3卷，51、77、53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

②⑤ 刘禾主编：《全球秩序与文明等级：全球史研究的新路径》，2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③ 克里尚·库马尔：《千年帝国史》，288页，中信出版社，2019。

④ 罗伯特·帕斯特：《世界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⑥ 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6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⑦ 巴里·布赞：《全球转型：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形成》，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⑩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52页，人民出版社，2009。

四、后殖民时代的“民族自决”与帝国转型

(一) “民族自决”原则与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

凡事都有两面性。为侵略扩张辩护的主权理论同样暗含了自我否定的因子。西方的殖民入侵实际上是一次东西方思想观念相互碰撞、西方意识形态向东方扩张和渗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主义在亚非拉地区流行最广、影响最大。在殖民主义入侵前，第三世界人民并非忠诚的民族主义者，而更多效忠于他们的族裔和部落集团。“帝国主义的入侵则直接挑战了第三世界人民的政治认同、自我价值和尊严感。作为一种回应，第三世界人民需要加强它们自己的价值和重要性，因此它们通过在更大范围诉诸民族性来完成这点。”^①

民族主义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欧洲殖民扩张的应激反应。民族主义理论深入人心，直接导致了亚非人民民族身份的发现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并触发了后来的民族自决和民族解放运动。^② 亚非拉地区的人民从接受民族主义思想开始，进而要求实现民族主义所主张的“民族自决”原则，落实到政治实践层面，就是为摆脱西方殖民统治而进行浴血斗争。就此而言，欧洲殖民者打着民族主义旗号的全球扩张，最终在占据大量殖民地的同时，也为20世纪殖民体系的瓦解埋下了伏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政治舞台上最令人瞩目的现象之一，就是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和第三世界群体性崛起。据统计，从1945年到1960年的15年间，至少有40个国家和8亿人口——超过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反抗过殖民主义，并赢得了国家独立。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评价道：“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以前还不存在如此迅猛进行的这样一次革命性反复。亚洲和非洲人民的地位以及他们与欧洲关系的改变，是一个新时代来临的最有力表现。”^③ 蓬勃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最终将维系几百年的殖民体系在短期内土崩瓦解。

不仅如此，在美苏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推动下，“民族自决”原则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准则。联合国宪章第1章第2条号召各成员国在“尊重平等权利和人民自决的原则基础上，发展各国间的友好关系，并切实采取适当措施加强世界和平”。这一规约在宪章的第55章中得到了再次重申，并在1960年通过的大会1514号决议中被进一步加以强调。最后，1966年联合国通过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公约》都声称所有人都拥有自决权。^④ 在上述一系列联合国决议和具有国际法性质的公约中，殖民帝国的合法性遭到彻底否定。主权法定原则与民族自决原则的结合，最终产生了上百个新兴的民族/主权国家。这样，肇始于欧洲大陆的主权国家体系首次在全球范围内得以践行，由此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社会。

(二) “前门驱狼，后门进虎”：美国用“民族自决”构筑新帝国

“一族一国”模式原本就不是世界政治体系的唯一选项。人类作为一种社会动物，天然包含着成为群体一员的渴望，并希望保持对群体的忠诚，但这种忠诚对象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它包括部落、宗族、城邦国家、王国、帝国等各种不同的政治类型。国家由民族主义宣传者代表，仅是诸多社会组织形式中的一种。^⑤ 在世界历史的实践中，只是由于欧洲（特别是西欧）国家率先崛起，由此使“一族一国”的国家观被有意无意地作为构建国家的唯一标准。

俗话说“一个人的美味是另一人的毒药”。民族主义既包含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正能量”，

① John Isbister. *Promises Not Kept: The Betrayal of Social Change in the Third World*. Kumarian, 1998, p. 105.

② 张旺：《民族主义与现代性：冲突及其化解》，载《教学与研究》，2020（7）。

③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14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④ 詹姆斯·梅奥尔：《民族主义与国际社会》，32-3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

⑤ 诺曼·里奇：《现代欧洲史（第5卷）：民族主义与改革的年代1850—1890》，63-64页，中信出版社，2016。

也包含了民族分离和分裂主义的“负能量”。在那些没有确立民族意识的地区，民族主义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政治中，都成为最具破坏力的力量。^①

东方国家奉行的大多是王朝或帝国体系，这与欧洲的民族国家体系迥然不同。帝国与民族国家是截然不同的政治实体，遵循完全不同的政治原则。东方的多民族帝国体系能够延续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原本有其逻辑自洽的运行法则。一般来说，民族主义的核心一般是种族或族群的均一性，坚信自己要比其他民族优越。相比之下，帝国基本上是多民族或多种族的国家，其追求的不是一种共同文化，而是强调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帝国凝聚力以垂直方向发展，即从统治者到平民，而非民族内部公民或成员之间横向的平等关系。^②此外，民族国家观实际上是基于个人主义。相反，在那些王朝和帝国中，当权者与民众更多是一种“统治与服从”的关系，民众更多是作为“臣民”而不是“公民”出现的。^③

从地缘政治博弈角度看，民族主义天生就是制造国家分裂的理想工具。摩根索曾指出：“减少较重砝码的方法典型地表现在‘分而治之’这一准则中。试图削弱竞争者或使之保持衰弱的国家，都采用这种通过分裂竞争者或使之保持分裂的分而治之的方法。”^④而民族主义的特点就是长于建国，短于治国。在所有民族主义的文本中，总是存在“外族人”这个无法被纳入共同体中的永恒“他者”。民族主义话语没有为缓解国内民族矛盾预留空间。因此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主义一再引发处在中心的主体民族与处在边缘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⑤

在国际政治现实中，世界上有2000多个“民族”，但真正单一民族国家不足20个。即使在民族主义的发祥地西欧，尽管这里的国家已经分得极为细碎，但仍存在民族混居和潜在的民族分离诉求，如英国北爱尔兰问题、西班牙的巴斯克问题、法国的科西嘉问题，等等。还有统计表明，全世界有5000多个少数民族或种族希望宣布为全国性的民族，有260多个非主体民族希望建立自己的国家。^⑥这些民族分离和国家增生浪潮几乎都与“一族一国”诉求有关。具体说，就是以民族为独立和认同主体，以民族自决为主要理论，以独立建国为基本目标。由于目前世界上已有近200个国家，人口在500万人上下的有87个、250万左右的58个、50万以下的35个，而且90%以上是多民族国家。^⑦这些非西方国家如果照搬“一族一国”建国模式，必然出现国家分裂、内战不止的悲剧性结果。如果按照民族界限一直分下去，世界地缘版图将无疑更加碎片化。而且，大规模的民族分裂运动都是伴随着无尽的种族屠杀、人口交换、地区冲突，整个世界将永无宁日。

“一族一国”原则与各国多民族混居的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矛盾，为少数西方大国利用“民族自决”原则打压和分裂对手，提供了甚为理想的战略工具。在历史上，利用“民族自决”（实际是民族分离主义）分裂对手的做法屡见不鲜。19世纪时，欧洲列强为弱化和消耗庞大的奥斯曼帝国，曾交替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在奥斯曼帝国内部制造和扩大裂隙。1797年拿破仑进军希腊时，曾让蒂利将军利用希腊人的民族主义感情来征服爱奥尼亚群岛：“如果居民们倾向于独立，那我们就设法助长他们这种情绪，并毫不迟疑地谈论希腊、雅典和斯巴达。”^⑧自19世纪后期以来，希腊、埃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门的内哥罗（黑山）、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等先后独立出来。在民

① 诺曼·里奇：《现代欧洲史（第5卷）：民族主义与改革的年代1850—1890》，62页，中信出版社，2016。

② 克里尚·库马尔：《千年帝国史》，20页，中信出版社，2019。

③ Hilal Khashan. *Arabs at the Crossroads: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Florida University, 2000, p. 23.

④ 汉斯·摩根索：《国际综合策论》，23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⑤ 柳亦博：《环世界与超国家：民族主义退场后的世界秩序重构》，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1（2）。

⑥ 马曼丽、张树青：《跨国民族理论问题综论》，176页，民族出版社，2006。

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全球民族问题大聚焦》，79页，时事出版社，2001。

⑧ 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上册，121页，商务印书馆，1995。

族分离运动强力冲击下，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领土由此丧失殆尽，并最终走向全面解体。

进入现当代后，西方大国更是用战略对手的民族问题大做文章，最终目标就是削弱乃至瓦解对手。苏联总面积2200万平方公里，是欧亚大陆上真正的巨无霸，因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主要对手。而苏联民族政策存在的巨大漏洞，被西方战略家利用得淋漓尽致。尼克松、布热津斯基等美国政要也主张应广泛利用和鼓励苏联境内的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引导这种情绪从要求经济文化的自主权转向政治上的分享权力，以至独立的目标发展，并就此提出了“和平演变”的举措。^①而戈尔巴乔夫轻信蛊惑，按照西方指示的道路进行改革，首先在波罗的海三国引发民族分离运动高涨。当苏联准备大举镇压时，西方不断施压阻止，最终使苏联的民族分离运动产生连锁效应，并由此导致苏联彻底解体。

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势头加快，美国的战略焦虑感日趋加重。自奥巴马担任总统之后，美国就开始将战略重心日趋东移，防范和遏制中国的势头极为明显。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更是公开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中美矛盾持续升级。2021年开始执政的拜登政府同样将遏制中国作为政策主基调。在此背景下，利用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问题分裂中国，就成为美国及西方世界阻遏中国发展势头的重要抓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疆、西藏、台湾乃至香港问题日渐升温。中国反分裂、反分离斗争面临巨大压力。

五、余论

要想摆脱西方国家打着“民族自决”旗号进行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除了在外交领域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还必须从理论上厘清“民族自决”理论本身的内涵和外延，并通过“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强力打造超越族裔层面的“国家民族”（即 nation）观念。^②具体地说，“国家民族”是从政治上界定“民族”，主张一国居民同属一个民族。正如所有法国人属于“法兰西民族”、所有美国人属于“美利坚民族”、所有中国人属于“中华民族”范畴。“国家民族”理论显然比“族裔民族”理论更有利于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维护和巩固现存秩序。这是因为，“国族”包括了境内全体居民，因而有利于强化国家凝聚力。它有效解决了族裔民族只涵盖部分居民、强化族裔意识易滋生离心倾向的弊端。与此同时，“国族”具有政治—法律含义。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只有“国族”才具有“民族自决权”，境由各少数民族便成为只有文化属性、没有政治属性（自决权）的“族裔”或“族群”。这种“一国一族”理论可以从理论源头上堵住各种分裂势力打“民族自决”牌的法理依据，最大限度地消除了国家分裂隐患。

需要指出的是，主权国家的巩固（政权建构和国族建构的完成），并不意味着第三世界国家彻底摆脱了西方大国的控制和操纵。立足于殖民统治的旧式殖民主义固然已成过去，但服务于资本积累目标的新殖民主义从未消亡。当第三世界经过数百年奋斗和自我调适，终于学会用民族主义武器建立国家和在国际上享有国家间平等与尊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正在推动世界政治从基于民族主义的主权国家体系，向基于资本主义积累逻辑的世界帝国体系转变，其最终目标就是将整个世界纳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继续处于边缘和依附状态。

^① 张建华等：《红色风暴之谜：破解从俄国到苏联的神话》，398页，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

^② 北京大学马戎教授对该问题有过详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理解“民族”概念大体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国内少数族裔（ethnic groups）定义为“民族”，并在此基础上强化“民族”认同；另一种是将全体国民作为一个“民族”进行整合。从世界范围看，后一种民族治理理论更为成功。上述观点散见于马戎教授的多篇文章，如《关于“民族”定义》，载《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全球化与民族关系研究》，载《西北民族研究》，2007（4）；《现代国家观念的出现和国家形态的演变》，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2）；《中国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状》，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不同文明基础上的不同话语体系与社会发展模式的多样性》，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9（6）。

这种世界体系转型早有苗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体系出现两大新趋势：一是第三世界的兴起（即民族解放运动），另一个是跨国公司的发展。^①二者看似互不相关，实则有着内在因果联系。民族解放运动固然是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族解放的结果，但也与资本主义财富掠夺方式从“强制”转向“非强制”直接相关。如果说殖民主义是一种凭借强权来直接进行统治的制度，那么新殖民主义就是一种以让予政治独立来换取经济上的依附和剥削的间接统治制度。事实表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并未侵占殖民地，但其通过各种方式竭力将第三世界纳入美国主导的“自由帝国体系”。尤其1991年苏联东欧阵营解体后，这种趋势愈演愈烈。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要想真正主宰自己命运，除了防范西方基于“一族一国”理论策动的民族分离主义，还要反抗西方基于资本积累逻辑打造的新帝国主义体系。

The “Weaponization” of Nationalism and the World Political Order

TIAN Wenli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 The multiple functions of nationalism have led to a tendency to “weaponize” nationalism since its birth. Nationalism was originally a product of the fragmentation of the European geopolitical map and had a positive nation-building func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European states. This resulted in a dual code of conduct and a corresponding dual world order: “national equality in Europe, national oppression in the Others”. After World War II, the rise of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s largely broke this unreasonable world order, but the Western powers, represen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turn dismembered non-Western countries in the name of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thus causing the continued fragmentation of the world’s geopolitical map.

Key words: Nationalism; Weaponization; World order; Impact

(责任编辑 林 间)

^① S. P. Varma.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he Third World: A Study in Changing Perspectives*. Vikas, 1988, p. 126.